

建國初期的政治謠言及其治理

施愛東

[提 要] 建國初期,政權剛剛易手,緊接著又是土地改革和朝鮮戰爭,一切社會平衡都被打破,針對新政權的政治謠言風起雲湧,彌漫全國,因此而派生的社會問題也多且棘手。新華社將這些謠言分成三類:攻擊時事政治的謠言、抹黑黨的政策謠言、挑撥幹群關係的謠言。但如果依照形態差別,我們又可以將之分為神諭及靈異謠言、末日謠言、恐嚇詛咒類謠言。這些謠言對新中國的政權和社會穩定造成了極大的衝擊,因而被中央政府升格到“反革命活動”的高度,給予了極其嚴厲的打擊,同時,打擊措施也嚴格區分了以“講、駁、追”為主的“宣傳模式”,以及以“殺、關、管”為主的“鎮壓模式”,後者是融合在“鎮反運動”中進行的。鎮反運動中全國共鎮壓了大約 30 餘萬名謠言家,鎮反之後,謠言滿天飛的現象得到扼制。

[關鍵詞] 土地改革 朝鮮戰爭 鎮反運動 會道門 謠言治理

[中圖分類號] I277/C953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0874-1824(2019)01-0156-14

一、政治謠言的界定

顧名思義,政治謠言就是與政治生活相關的,具有鮮明政治傾向的謠言,或者說謠言在政治生活中的體現。卡普費雷《謠言》一書為“政治謠言”列有單章,但並未給出定義,只是列舉了政治謠言的七大主題:一是關於操縱政權的背後黑手、關於幕後政權、秘密會社的;二是關於政敵之間秘密協議的;三是關於金錢醜聞的;四是關於政治家健康狀況的;五是關於政治人物性醜聞的;六是雙關語(政治家的公開表態與真實意圖相反);七是關於移民的(涉及背叛國家和血統問題)。而且卡普費雷認為:“謠言只是喋喋不休地圍繞著這一小部分主題轉。”^①

這七大謠言主題顯然是針對法國政治而言,難以套用於中國政治。沈遠新依據中國國情,重新歸納了政治謠言的六大主題:一是政治內幕;二是政治腐敗;三是人事任命;四是個人生活;五是重大政策的調整和變動;六是重大突發性事件。此外還有“關於政治家的健康、競爭、秘密以及在重大政策調整中的關鍵性作用等”。作者據此認為:“政治謠言是謠言的一種,它所涉及的是政治性問題,是人們傳播的毫無根據的政治消息或雖起之有因但卻嚴重失真的政治消息。”^②該定義雖然略嫌空泛,但要給出更具體、更精準的定義也不容易。

政治是各種利益集團或權力主體維護自身利益的行為,以及由此結成的關係的總和。狹義地理解,政治就是與政府、政黨治理國家相關的行為。政治行為的共同特點是一切以利益為中心,是

最具博弈性、鬥爭性、普遍性的人類行為，因而也是透明度最低的一種社會行為。有人類社會的地方就一定有政治，有政治的地方就一定有謠言。所以說，政治謠言幾乎是與人類社會同在的文化現象。

政治謠言之所以難以界定，是因為政治行為無處不在。任何一則謠言在特定歷史時期、特定條件下都有可能被視做政治謠言。比如一則關於農田病蟲害的謠言，如果放在解放初期，就有可能因為“破壞農業生產”而被視做政治謠言；又比如，如果我們傳播一則同事的緋聞，恰恰這位同事的配偶是名軍人，那我們就有可能背上“破壞軍婚”的政治罪名。

此外，還有學者將政治謠言區分為“主動型政治謠言”與“被動型政治謠言”。“主動型政治謠言是指政府主動將政治謠言運用於政治管理中為其政治管理工作服務。被動型政治謠言是指來自民間的、影響政府的政治管理活動的政治謠言”。該作者認為主動型政治謠言具有政策試探的功能，以及政策強化的功能。^③當代網絡辭彙中也有“官謠”一詞，網民用以特指官方媒體發佈的不實信息。但是，許多謠言學者如卡普費雷等都在謠言定義中指出了謠言“非官方”或“小道消息”的性質，如果我們將官方發佈的不實信息定義為主動型政治謠言，勢必要重新考量謠言的定義及其與“官方”的微妙關係，本文也將受阻於定義問題而躊躇不前。因此，本文傾向於使用“公開謊言”而不是“謠言”來指稱官方發佈的不實信息，不對“主動型政治謠言”展開討論。

本文不擬就定義問題詳加辨析，暫且將政治謠言界定為：某些利益集團、利益階層出於特定政治目的，通過虛構故事、歪曲事實、惡意揣測等手段，對其他具有敵對或競爭關係的政治集團、政治人物，及其政權合法性、施政能力、生活作風等問題進行誣陷、誹謗、抹黑的攻擊性政治傳言。

政治謠言不僅複雜、多樣，而且具有強烈的時代特點。本文僅對建國初期的政治謠言以及中央政府的應對措施進行概要式的回顧和梳理，以期為政治謠言的當代治理提供一點借鑒。

二、建國初期政治謠言概況

毛澤東指出：“凡是要推翻一個政權，總要先造成輿論，總要先做意識形態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階級是這樣，反革命的階級也是這樣。”^④可是，弱勢政治集團不掌握主流媒體，其話語權總是會低於強勢政治集團，因而更傾向於使用小道消息、謠言來形成輿論，對強勢政治集團形成壓力。政權交替的時代，強弱關係剛剛逆轉，政治平衡急劇動盪，民心向背生死攸關，因而往往也是政治謠言最活躍、危害性最大的時代。

建國初期，中國社會滿目瘡痍百廢待興，統治階級和被統治階級的社會地位發生了驚天逆轉。中國共產黨正領導勞動人民努力建設新中國，被打倒的舊統治階級當然不會就此善罷甘休，他們已經沒有辦法依靠公開的軍事和政治手段與共產黨展開政權爭奪，只能借助謠言，將鬥爭轉入地下。

建國初期的政治鬥爭是生死存亡的鬥爭，因此，中央政府將政治謠言上升到了“反動謠言”或者“反革命謠言”的高度，給予了前所未有的高度重視。1950年底，時任公安部部長兼北京市公安局局長的羅瑞卿在《一年來鎮壓反革命分子破壞活動的報告》中特別指出了政治謠言的氾濫問題：“反革命分子還經常造謠惑眾，通過封建會道門和落後分子進行傳播，破壞中國共產黨和人民政府的威信，挑撥政府和人民的關係。例如在國慶時，散佈謠言說：‘蔣介石的飛機要來轟炸。’麥田有了害蟲，欺騙農民說：‘這是天意，不能捉，愈捉愈多。’在斯德哥爾摩宣言徵求簽名的時候，造謠說是‘徵兵’。前些時又散播‘割蛋、割乳房製造原子彈’的謠言。美帝國主義發動侵朝戰爭後，又散佈恐美、親美思想，散佈變天思想，為美帝國主義的侵略張目。”^⑤

報告中提及的“封建會道門”，由於其具有集團性和組織性，系統複雜，名目繁多，兼有了“封建”、“迷信”、“地主官僚”、“地痞流氓”、“反革命”等多重負面標籤，因此被新政權視做社會穩定最大的破壞力量，成為重點打擊對象。建國初期的各種會道門組織達到二百多種，一貫道的活動尤為猖獗。1951年5月，北京市軍管會曾經公告了“判處死刑、立即執行的反革命罪犯共221名”及其罪行簡介；^⑥8月，軍法處又公佈了237名死刑犯的反革命罪狀。^⑦合併兩份罪狀錄，其罪名中包含“製造謠言”或“散佈謠言”的死刑犯合共198名，佔全部死刑犯的43.2%，這個比例是非常之高的。我們還可以進一步統計不同身份的謠言家在全部謠言家中所佔的比重（如表1）：

表1 謠言家身份佔比

謠言家身份	人數	佔比
一貫道信徒(主要是壇主和點傳師)	78	39.4%
特務(國民黨中統、軍統、三青團、青年軍等)	61	30.8%
九宮道信徒	19	9.6%
惡霸、地主、慣匪、漢奸、其他會門成員等	40	20.2%

注：表格中有些兼有多種身份的謠言家，如有四名既是特務又是一貫道的，表中均將之歸入公告中的第一身份，不在其他身份中進行重複計算。

從這份數據可以看出，作為“反革命謠言”的生產者和傳播者，一貫道已經超越國民黨特務，成為第一要害，如果再加上九宮道、八宮道等其他道門，會道門已經當之無愧地成為政治謠言的主要發佈者。他們煽動群眾抗交公糧、拒買公債，蠱惑群眾“不要參軍”，甚至帶領一些不明真相的群眾毆打政府工作人員。一個極端的例子，1950年7月7日，山西雁北行署水利局幹部曹克維到懷仁縣八莊鄉檢查水利設施，由於當地正流行“割蛋”謠言，對外來人員高度敏感，於是有人挑唆村民，指認曹克維就是政府派來“割蛋”的，恐慌的村民群起而對之圍攻、毆打，最後竟然殘忍地將之活埋了。這是一起典型的由謠言而導致的駭人聽聞的殘殺國家幹部的惡性事件。^⑧

上海解放前夕，一貫道就製作、散發了大量的文件和傳單，妄稱“天下將要亂了，大劫大難快來到”，^⑨煽動信徒起來抵制新政權的產生。建國之後，這些封建會道門仍不死心，依然妄圖以謠言作為輿論發動機，組織力量推翻新政權，回到舊社會。一貫道提出了“依靠地主、團結富農、中立中農、打擊貧雇農”的反動口號，說什麼“八路軍是打天下的不坐，一貫道是坐天下的不打”，妄想“以道治國，以道化黨”，代替共產黨“坐天下”。^⑩洛陽九宮道更是公然揚言“八路軍打天下，九宮道坐天下”，妄圖建立“中天國”^⑪新政權當然不能容忍這樣的政治謠言，很快就將一貫道、九宮道等會門教派定性為“反革命組織”，1950年公安部《關於全國公安會議的報告》中特別指出：“會門特別是一貫道是目前和我們作鬥爭的最大的反革命組織。”^⑫相應的，這些封建會道門所散佈的各種謠言也就被定性為“反革命謠言”。

中國青年社的一本時事小叢書認為：“特務勾結一貫道那樣的反動封建會道門，還有反動地主，把謠言越傳越廣。我們要進行什麼工作，他們就造什麼謠；世界大事有什麼變化，他們也就跟著造謠。而且全國各地幾乎是同時發現同樣的謠言，可見謠言是有組織、有計劃編造的。”^⑬這一判斷並非臆斷，事實上，後來查抄到的許多會道門首領的“反革命證據”中就有大量的謠言底本，如：“（北京）九宮道壇主金漢魁專門製造反對政府、侮辱政府、為美帝國主義和蔣介石匪幫張目的謠言，由他親手製造寫成的反革命謠言，被搜出來的就有七大本、九十多種。”^⑭

1950年的一份新華社通稿將建國初期的反革命謠言分成了三類：“第一類是屬於時事性的，即鼓吹三次大戰，誇大美帝國主義的力量，瞎吹原子彈厲害，以恐嚇群眾。第二類是屬於政策性的，對人民政府的稅收、公債、救災、生產、婚姻、土改等項政策，故意作各種歪曲，以破壞生產建設和其他工作。第三類屬於挑撥群眾和幹部關係的。”^⑮如果我們換一種視角，不從謠言的指向和目的，而從謠言家的謠言基礎出發，還可以做出更有意思的劃分。

三、神諭及靈異謠言

會道門“反革命謠言”最突出的特點是借助神諭及靈異謠言質疑新政府的執政合法性。在傳統中國的政治宣傳中，統治階級的統治合法性是君權神授、奉天承運，這一觀念已經根深蒂固地紮根於民眾思想之中，因此，借助神諭打擊新政府的政權合法性，是會道門最拿手的謠言手法。

所謂靈異謠言，指的是通過猜想和拼湊，將某種自然或社會現象與虛擬的靈異事件或其他偶發事件聯繫到一起，生拉硬扯地附會、解釋為一種反科學反現實的、神秘的對應關係。^⑯比如朝鮮戰爭爆發後，各種會道門歡呼雀躍，上竄下跳積極策應，妖言惑眾，還編成順口溜大肆散佈。上海的一貫道說：“民國四十年，八魔鬧中原，去了口上口，來了天上天。”^⑰八魔指八路軍，口上口指日本，天上天指美國，謠言暗示從1911年至1951年是“民國”時代，1951年之後將要改天換日，美國將代替日本，主宰中國大地。西南地區的一貫道則說：“一人口上口，擾亂中華九十九，一人加八王，一定主中華。”^⑱這裡的美國不再是天上天，變成了一人加八王，意思是日本只是擾亂中華，唯有美帝才是中華之主。

每當水旱災害、蝗蟲肆虐、疾病流行、突發安全事故，群眾的生產和生活遭遇暫時困難的時候，馬上就有會道門出來散播各種靈異謠言，將“天災”轉嫁成“人禍”，諭示新政府的“倒行逆施”觸怒了神靈，才導致災害發生。1949年5月上海解放後，恰逢颱風襲擊，海水衝垮海塘，有一貫道的點傳師造謠說，“海龍王作怪，不可違反天意”，^⑲還煽動不明真相的群眾阻撓搶修，淹死政府工作人員。幾乎同一時間段，北京因為鬧鼠疫，政府為了消除疫病，在許多地方都撒了石灰，結果一貫道又出來造謠說：“八路是三十七年（1948年）入的關，三十七年是戊子年，走耗子運，現在吱喳抓耗子，八路要完了。”他們還挖空心思將一張白紙迭五折，中間剪一刀，展開可將紙條拼成“介石回北平、朱毛二命亡”字樣，以蠱惑人心。^⑳

會道門擅長利用拆字、解字之類的雕蟲小技來生產靈異謠言。以四川梓潼縣的會道門謠言為例，1950年2月解放軍剿匪時期，一貫道造謠說：“解放軍的帽徽是五角星，象徵五洋鬧中華，上面是‘八一’，就是九九八十一天，解放軍不到一百天就要走，現在是三期末劫，文昌帝君已上天去搬天兵天將下來打解放軍。”^㉑同在四川，綿陽的會道門對解放軍帽徽的攻擊方向又不一樣，說什麼：“八一帽徽是九九八十一個大劫難，現在天數已到。”“九九歸中國，八一死四川。”^㉒到了重慶，就變成了“解放軍的八一帽徽就表示給人民帶來九九八十一劫”。^㉓

1950年6、7月間，四川梓潼各鄉組織農協會，一貫道又造謠說：“你們看農協會的會（會）字，上面是八一，表示八路軍，中間是老母的母字，表示老母，下面是日字，表示青天白日。意思是八路軍走了，老母出現得見青天白日，國民黨就會轉來。”^㉔同在四川，綿陽的會道門對農協會的解讀也不一樣，唯有惡意的性質是相同的：“農協會就是膿血匯，膿血匯在一起，人就不能活，參加凶多吉少。”^㉕

各地會道門組織紛紛利用神諭預言共產黨坐天下不會長久，他們大都把這個時間長度設置為

兩年左右,短則認為“共產黨只有二十八天的時間”,理由是“五星不作主,共字是廿八”,^②長則認為三年半,理由是“毛澤東的毛字只有三筆半”。^③山西的一貫道也說:“共產黨的天下只有三年零六個月,到1953年就完了。”還說:“國民黨垮了台,共產黨也不長久,真命天子十八子就要主世了。今年是牛八當道,要死很多人。”^④所謂十八子即李文斯,山西人,1915年生,一貫道培養的接班人;1949年為牛年,牛八兩字合起來是個朱字,影射朱德總司令。

一些具有象徵意義的符號、物品,也常常被用來穿鑿附會,以體現謠言家的反動意志,“石獅子”就是這樣一種象徵符號。南京剛剛解放不久的一天下午,原蔣介石“總統府”前突然來了許多人圍觀門前兩座石獅子,有人搖頭,有人歎息,有人議論,說是石獅子流淚了,走動了,可見石獅子想念國民黨、蔣介石。^⑤無獨有偶,1950年夏天,北京的石獅子也傳出故事,有人說親眼看見天安門的石獅子流淚了,然後就有人說:“天安門的石獅子在李闖王時就流過淚,天下沒有長久,如今又掉了淚,看起來共產黨也長不了。”^⑥李闖王時的石獅子流沒流淚,誰也不知道,謠言要的就是借助“石獅子流淚”的虛擬意象,將李闖王的命運與新政權的前景進行惡意比附。

神諭謠言的一個突出特點是不以正常凡人的語氣說話,而是使用古怪的韻語,以“謠讖”的形式開言,語義朦朧,朗朗上口,從而使之既有神秘色彩,又能夠借助前後關聯的韻語得到相對穩定的傳播。比如1950年昆明縣西郊農村補徵1949年農業稅,一貫道造謠說:“空空空,四方穀米要集中,餓死貧窮漢,氣死富家翁。爭爭爭,不徵糧稅要徵兵,九女共一夫,黃人裕後昆。”^⑦又如四川綿陽的匪特與會道門謠傳:“一月緊,二月鬆,三月活捉毛澤東;南京上海國軍佔,日軍出兵五十萬,蔣介石從美國拿回原子彈。”^⑧還有西南地區廣泛流傳的一首“童謠”:“一升米,一把柴,蔣委員長要回來。八月緊,九月鬆,十月趕走毛澤東。”^⑨這樣的“謠”言一聽就會,易學易記,特別適合口口相傳。

四、末日謠言

散佈末日謠言是近代以來各種會道門得以迅速擴張的主要輿論手段。這類謠言通常同時包含著兩個層面:第一個層面是人類末日即將到來,整個世界將變成人間地獄,無人能夠倖免於這場災難;第二個層面是,如果你加入我的會道門,就能辟邪消災、萬事吉祥,在世榮華富貴、死後升入天堂。

建國初期,湖北紅安縣至少有6個反動會道門,大都不同程度地散發過末日謠言。比如1951年一貫道造謠說:“共產黨站不長了,今年是人類的末年,人都要死絕,只有入道才能免災。”道德金門造謠說:“天下要大亂,老百姓要過刀劫,入了道的人什麼黨都可以抵抗得住。”^⑩河南沈丘縣的老母道也說:“三期末劫來臨,要有大災大難。北邊有千軍萬馬,要大反大亂。”^⑪他們還做了很多半斤重的白饅,內包紅芋,聲稱饅內的紅芋代表紅軍,買了他們的饅吃,就能把紅軍吃掉,消災避難,保一家平安。上海的九宮道宣稱世界末日即將來臨,天下將要大變:“紅羊死,白羊生,好八不如孬九。”^⑫所謂紅羊,指的是共產黨紅色政權;所謂白羊,也即白陽,指的是這些會道門組織;八即八路,九即九宮道,意思是說八路再好,也不如最差的九宮道,只有入了九宮道,才能避禍消災。

描繪血腥圖景,渲染恐怖氣氛是末日謠言最常見的手法。1949年蘇北地區發生災荒,政府組織生產救災時,反動會道門就造謠說:“頭九二九像春天,家家戶戶哭活天。”“老天爺爺不長眼,來年白骨堆成山。”解放軍渡江作戰前夕,一貫道也是借助末日謠言製造恐怖氣氛:“百萬男兒出華中,千里橫渡滿江紅。”又說:“眼看大世界,遍地起戰爭,十男死九個,九女合一夫,百人一床被,千

人一升糧，死屍堆如山，血流滿江紅。”³⁵

朝鮮戰爭爆發後，各種恐懼、崇拜美國先進武器，認為美國將會投放原子彈、打敗共產黨的謠言滿天飛。1950年冬天，一貫道在各地造謠說：“大劫已經來了，十月十五日血染鴨綠江，惹怒了美國，三次世界大戰要打起來了。東北大殺三陣，父不能見子，子不能見父，哀鴻遍野。”“以後刀兵災、瘟疫災、饑饉旱澇、蝗蟲水災，種種災難即將降臨，要刮七七四十九天罡風，飛機飛不起，大炮打不出，要鬧到天崩地裂。”³⁶“三期末劫來臨，將來有飯無人吃，有衣無人穿，有屋無人住。”³⁷“第三次世界大戰一定要打，美國和日本都要出兵打中國，中國是天災人禍，人要死去一半。”甚至說上海、南京都已經被原子彈轟炸過了。³⁸湖南炎陵縣的紫霞教也放風說：“現在三期末劫來臨，八難之災下降的時期，血水成河，屍骨堆山的日子很快就要到了。”³⁹他們威脅年輕人不要參軍，不參與抗美援朝，不要在反對使用原子彈的聲明上簽名，否則國民黨回來後沒法交代。

所謂“三期末劫”是一貫道等多個民間教派共同使用的末日術語，雖有小異，但大旨相同，都是把人類歷史分為三個時期，把民國以後的一萬零八百年定為第三個時期，也即“白陽劫期”。早在抗戰勝利初期，一貫道就曾造謠說：“世界大戰起來就是三期末劫來臨，四十九天不見天日，天昏地暗，十人九死一生，只有入道佛燈照耀，改天換地才能躲災避難，活著享福，高官得坐，駿馬得騎，成為人上人。死後天堂掛帥，地獄抽丁，能上極樂天。”⁴⁰

五、恐嚇詛咒類謠言

建國初期的土地改革對於農民來說，是一場翻天覆地的革命運動。它徹底改變了舊的生產關係，使億萬農民從政治上、經濟上得到解放，但也徹底改變了舊社會既得利益者的命運。這些利益集團當然不會就此甘心，他們生產了大量的恐嚇詛咒類謠言，惡意歪曲和抹黑新政府的生產政策和措施，煽起部分民眾對於革命幹部的不滿情緒，挑撥幹群關係，製造各種障礙，以阻止新政府的各項工作進程。

為了阻止土改運動的深入，蘇北地區的一貫道就造謠說：“富貴在天，何必你爭我奪，剝他人之肉豈能自肥。”⁴¹重慶的一貫道則說：“現在人民政府分田地，就是財考，我們不能貪財，不能要田，也不能要地，有財即有禍。”⁴²周而復在《上海的早晨》中也提及一貫道的乩訓謠言：“草頭將軍不出世，社會永無安寧日。一九五二年，應該改皇元。誰要分人田和產，子孫萬代難還原。”⁴³所謂草頭將軍，即“蔣”，意思是說蔣介石1952年就會打回來，很快就得改朝換代，誰要是分了別人的田產，將來一律都得秋後算賬。

他們不僅反對土改，還對徵收公糧、清匪反霸、減租退押、農田水利建設等中心工作進行造謠誣蔑，百般阻撓。朝鮮戰爭爆發之後，甚至出現了“三次世界大戰開始，五國出兵朝鮮”，以及“‘簽名’就是‘遷民’，蔣介石與毛澤東已經講和，因蔣介石不信任毛澤東，故此毛澤東叫百姓簽名”等謠言，有些黨員甚至嚇得要退黨、團員嚇得要退團。⁴⁴潛伏在江西豐城的國民黨特務造謠說“共產黨馬上要開始移民，把豐城百姓統統移到樂安，樂安的換到豐城”，還散佈誣蔑領袖的反動歌謠：“朱德毛澤東，做事太不公，窮的冇飯吃，富的要充公，一些人民票，百姓都不要。”聲稱“國民黨馬上就會打回來，共產黨的天下坐不長久”。謠言導致社會秩序大亂，人心惶惶，物價飛漲，甚至有些剛參加工作的新幹部都害怕變天，選擇放棄革命工作回鄉務農。⁴⁵

無論是好事壞事，只要是共產黨辦的新鮮事，幾乎都會受到謠言的攻擊。1949年冬，北京市衛生局為了防止獸疫傳染，進行家禽家畜摸底調查，特務分子卻造謠說：“調查養雞，是要養雞的人往

派出所送雞蛋。”部分市民誤信謠言，嚇得趕緊把雞賣了或吃了。⁴⁸甘肅的蘭新鐵路永登段通車，本來是件好消息，一貫道卻造謠說：“第三次世界大戰打起來了，共產黨沒有辦法，準備把火車修通逃走。”⁴⁹

建國初期的會道門，尤其是一貫道、九宮道的謠言具有明顯的政治指向，他們的目的就是為了煽動不明真相的群眾共同抵制新政府，顛覆新政權。朝鮮戰爭爆發後，貴州遵義的一貫道和紅燈教勾結反共特務，謠傳第三次世界大戰爆發了，十幾個國家聯手起來打共產黨，共產黨保不住了，國民黨馬上就要回來，到時不知要殺多少人。還有說：“美國又向蘇聯宣戰，飛機兩千架轟炸莫斯科。”他們甚至編了一首惡毒詛咒的字謎詩用以攻擊新政權：“二十八宿在下頭(共)，飛來飛去半筐遊(匪)，西方女兒把花戴(要)，忙去人心來當頭(亡)。”⁵⁰貴州綏陽縣的會道門甚至直接借助降神，傳唱反共歌詞：“努力一條心，消滅共產黨，快殺八路軍，如果不齊心，皇天有眼睛，將後取勝利，萬民也占恩，人民不怕苦，努力平共軍，那時有好處，天下就太平。”⁵¹

詛咒新政權，必然也會詛咒新政權的領袖人物，毛澤東主席和朱德總司令成了首當其衝受到反革命謠言攻擊的革命領袖。廣東茂名縣的會道門道首郭某，在引導群眾拜神時，就公然教唱：“第一拜，毛××死得快；第二拜，國民黨回來快；第三拜，道徒好世界。”⁵²雲南安寧市的一貫道也散佈謠言：“先殺豬(朱)，後鉗毛，還是老蔣有功勞。”⁵³為了達到“亂局”的目的，一些會道門不僅口頭散佈恐慌謠言，而且裝神弄鬼付諸行動，對謠言內容進行實際操演。

1950年4至9月間，華北乃至西北部分地區爆發了一場駭人聽聞的“割蛋”謠言，大致內容是說：毛澤東和蘇聯訂了合同，聯合製造原子彈(或者用來對付美國原子彈的“陰陽彈”)，中國出原料，蘇聯出技術，其原料就是男人的睪丸、女人的乳房和子宮。共產黨於是派出便衣部隊下鄉，專門割了這幾樣東西送到蘇聯去，一個男人的睪丸或女人的子宮可以換三塊大洋。還說便衣部隊都經過專門訓練，個個飛簷走壁，還會用掀門入戶、迷魂拍花，他們白天偵察，晚上行動。“謠言愈來愈奇，這個村說那個村的某人被割，那個村說這個村的某女被挑，說的有名有姓，有根有據。更有甚者，村東的人說村西的某人被割了，村西的人說村東的某女被挑了，說的神乎其神。”⁵⁴謠言所到之處，氣氛高度緊張。

為了進一步製造恐怖氣氛，一貫道趁機裝神弄鬼，操演謠言。到了晚上，他們就將麻雀塗上硫磺點燃，說是“藍火彈”；或者用紅布包裹手電筒亂晃，說是“紅火彈”；還有人頭戴假面具，手套鐵爪子，在群眾的窗戶上亂抓亂喊，說是“妖魔出世”。⁵⁵許多地方被攪得人心惶惶不可終日，人們白天不敢下地勞動，夜裡不敢脫衣睡覺。每到夜裡，男人輪流站崗放哨，婦女兒童擠在一起睡通鋪，稍有異響就會驚得一片呼號，此起彼伏直到天亮。山西省的割蛋謠言“2、3個月之內，蔓延到30多縣。弄得人心惶惶，青年逃跑，田地荒蕪”。⁵⁶

“割蛋”謠言之所以被視做政治謠言，不僅因為其破壞社會治安和農業生產，還因為“反政府、反蘇聯是謠言的基本政治傾向”。⁵⁷時任山西省委書記的賴若愚就將之定性為“政治性的活動”。⁵⁸

六、謠言治理：講、駁、追

建國初期的謠言治理，是從“文治”和“武治”兩方面著手的。所謂文治，也即主要從謠言受傳者一方入手，從思想上、情感上做好宣傳教育以及闢謠批謠的工作，我們可以稱之為“宣傳模式”。羅瑞卿《關於全國公安會議的報告》中對此有明確指示：“對付反革命謠言，必須實行講、駁、追三個字的政策，即加強宣傳，對謠言正面加以駁斥，以及追究謠言的來源等。除配合宣傳、駁謠外，追謠

主要是各級公安部門的責任。”^⑨

(一)“講”是針對普通民眾和底層道徒的宣傳工作。

1. 建立宣傳網絡,加大宣傳力量,樹立民眾對新政府的信心。

1951年元旦,中共中央發佈《關於在全黨建立對人民群眾的宣傳網的決定》,承認由於各級黨組織忽視了對群眾的政策宣傳,以至於有許多謠言,或者錯誤、反動的傳言經常在群眾中流傳,而黨的政策和主張卻沒有在群眾中得到充分宣傳和解釋,對黨和人民的事業造成了損害。“黨必須堅決消滅這種現象,加強對人民群眾的宣傳工作。為此目的,就必須有系統地建立對人民群眾的經常性的宣傳網,即在黨的每個支部設立宣傳員,在黨的各級領導機關設立報告員。”宣傳員的任務,除了宣傳黨和人民政府的政策,還要負責“批駁各種反動謠言及在人民群眾中流傳的錯誤思想”。^⑩

1950年代織起的這張強大的宣傳網絡,從上到下一直延伸到了全國每一個角落。宣傳員不僅負責宣講黨的政策,還盡可能地為不識字的工友、農友讀報紙,放廣播,編壁報,刷標語,同時還要負責上報和澄清、批駁各種流傳於民間的謠言和錯誤觀念。據不完全統計,到1951年底,全國已有宣傳員192萬多人,報告員約5萬多人,還有大批的群眾宣傳積極分子;到1952年底,全國群眾宣傳網普遍建立,有些地方黨組織可動員的宣傳力量達到總人口的15%以上。^⑪經過宣傳員的耐心宣傳和教育,廣大群眾對於新政權的信心逐步建立起來,比如在山西,“有些誤信謠言的農民表示:今後再不上當,要安心生產了……被特務所利用的封建會門已被孤立起來,部分退道群眾表示:如果點傳師來了,一定向政府報告。”^⑫

2. 辦學習班、開座談會,傳授科學文化知識,用通俗易懂的宣傳方式粉碎謠言。

建國初期,我國的成人文盲率高達80%以上,婦女人口中的文盲率更是高達90%以上。^⑬農民對於外部社會的知識知之甚少,很容易受騙上當。他們的觀念世界一片混沌,共產黨不去佔領,會道門就會去佔領。比如在貴州興義的鄭屯一帶,一貫道徒大多數是一些十幾歲的小姑娘,之所以出現這種現象,是因為一貫道造謠恐嚇說:“共產黨來了要拉小姑娘去灌水銀,吃了以後不會生育,入一貫道以後吃了也不怕。”許多小姑娘聽了之後非常害怕,為了免災,只好交半塊小洋加入一貫道。當地生活資料貧乏,一貫道甚至造謠說:“共產黨不但共產共妻,還有聞香隊,哪家有好吃的都知道。”^⑭類似這種荒誕的謠言,在一些偏遠地區依然大有市場。

要在短時期內掃除文盲,大幅提高民眾的智識水平是不大可能的,因此,宣傳部門一直要求報紙和廣播台把稿件寫得更通俗一些,借助民校、冬學、掃盲班、代表會等宣傳機構,用老百姓喜聞樂見的方式來傳播時事、政策和科學文化知識。“(山西省)榆次專區並以各種模型、漫畫和幻燈進行宣傳,幫助人民具體瞭解特務的造謠活動。榆次城放映的反謠言幻燈片,七天內觀眾達萬人,附近村莊的農民都紛紛趕來觀看。”^⑮有些縣區幹部“用出壁報、說鼓書、打竹板、唱小調、拉洋片等形式揭露反映一貫道破壞、造謠、騙人的犯罪事實”,^⑯也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北京電影製片廠1952年出品的《一貫害人道》在各國各地公開發映,更是效果非凡。

另一方面,經常性的幹部時事政策學習,加強了宣傳員本身的文化素養,從根本上提高了幹部的政治水平和文化水平,為闢謠駁謠打造了一支更有力的宣傳隊伍。“山西省很多縣份,都曾為此召集了三、四百人到千餘人的縣、區、村幹部會議,討論朝鮮戰爭形勢、美國侵略台灣以及特務造謠活動的特點等問題,並通過幹部向人民群眾進行時事教育。”^⑰

3. 注重發揮群眾團體的作用,佔領大中小學校這個重要陣地。

青年學生有一定的文化素質,不容易受到會道門謠言的污染,是一支可造、可靠的政治宣傳力

量。在北京，市教育工會、市學生抗美援朝聯合代表大會通過了《北京市教師、學生、職員、工友愛國公約》，其中特別要求“提高警惕，檢舉特務，追究並肅清反革命謠言”，以及“借助通俗文藝以及通俗手法，做好宣傳工作”。^⑧各大中學校積極回應，還依照該公約分頭制定了各自的“愛國公約”。在江蘇徐州，幾乎所有公私立小學均舉辦了“抗美援朝中心週”：“在中心週裡，學校領導舉行各種報告會，幫助學生分析、批鬥一些混亂思想和匪特散佈的謠言，發動兒童查謠和追謠……不少學校根據年級舉辦時事測驗，把分數記入成績冊，作為常識科學習成績的一部分。”^⑨

4. 讓悔改的謠言家現身說法。

對於較低文化層次的平民百姓來說，抽象教育不如直觀教育，講道理不如擺實物、舉實例，讓謠言家現身說法。在北京，市公安局 1951 年 1 月在中山公園水榭舉辦了題為《一貫害人道》的罪證展，參觀者每天多達 4,000 餘人。罪證展中還讓已經悔過的會道門壇主當眾表演“扶鸞請仙”等迷信騙局，讓許多不明真相的群眾大開眼界。“許多道徒看了這個表演後，有的邊哭邊痛罵一貫道的卑劣行徑，有的幡然悔過，當場表示退道。”^⑩在山西，“忻縣專區曾組織悔過退道的一貫道頭子和扶乩手，向群眾坦白他們騙人害人的實情。忻縣上花莊村在進行這種教育時，被騙群眾爭相訴苦，紛紛揭發一貫道的罪惡。該村並將道首所騙取勒索的衣服、白洋、登雲鞋、銀器及其他迷信品開了個展覽會，被騙入道的五百名道徒經這番活生生的教育後，全部退了道”。^⑪

5. 扣帽子、舉實例，徹底搞臭謠言家。

“扣帽子”是政治鬥爭中最常見的一種污名化策略。給敵人扣上一頂污名化的大帽子，貼上污名化的標籤，就等於將之與一系列眾所周知的污點信息捆綁在一起，攻方毋須過多的言語和揭露，就能使公眾在沒有任何可靠事實依據的情況下，迅速將敵人歸入到污名隊列之中，從而在心理上排斥敵人。

無論傳謠者還是闢謠者，都偏愛給對方扣帽子。比如，謠言家偏愛給共產黨扣上妖、魔、劫的帽子，貼上災難、末日、殺人、血光、割蛋、割乳、挖子宮的標籤，讓人一聽到共產黨的名頭，就聯想到這些令人恐怖的意象。而在北京市政府公示的反革命分子罪行佈告中我們可以看到，這些反革命分子不僅是反革命，他們往往同時也是惡霸、地主、慣匪、漢奸、日偽翻譯、偽甲長，他們的行為總是與黑、偽、一貫、無恥聯繫在一起，作惡行為總是離不開姦淫、奸佔、奸拐、虐待、拐賣、敲詐、勒索、欺騙、毆打、霸佔、勾結、貪污、逼迫、煽動、造謠、販賣毒品等等。

針對普通老百姓喜歡議論男女之事，又憎恨姦淫行為的心理特點，許多報導都會渲染反革命分子謠言家的姦淫本色。如在一次群眾大會上，一個覺醒後的“女三才”講到一個姐妹如何被強姦、兩名要求退道的女道徒如何被亂棍打死的時候，台下聽眾“個個瞪大了眼睛”。^⑫當時最流行的一本反會道門普及讀物《一貫道是什麼東西》，就曾列單章揭批一貫道的“結丹”罪行：“萬惡的一貫道匪徒們經常用‘結丹’的名義強姦女道徒或坤三才，他們詭稱是神佛附體，或‘老母的意旨’，選擇女道徒供其泄慾。他們說這是：‘借人慾，補聖慾’，‘借人胎，補聖胎’；他們用猥褻的‘春宮’誘惑婦女，管它叫：‘道胎圖’。京郊農村裡，流行著一句俗諺：‘一叩首，再叩首，大姑娘跟著點傳師走。’一貫道內部也有句傳說：‘嘴對嘴，喂佛水；肚對肚，渡上西天。’有很多被姦污的女道徒們羞憤而死，有的在道首的淫威下，忍氣吞聲，不敢聲張。”^⑬北京市公安局 1951 年 1 月舉辦的一貫道罪證，其中就有“北京總壇八大代表之一的吳錫山家裡搜查出的春宮畫，道首張誠忠家中搜查出的春宮圖煙斗等”，^⑭以此坐實一貫道道首的荒淫與無恥。

(二)“駁”是最直接的闢謠方法。針對具體謠言案例，用事實粉碎謠言。

1950年夏天,北京曾經盛傳:“鼓樓冒煙、石獅子流淚、萬壽山鬧鬼、風水破了,要改朝換代了。”^⑥所謂石獅子流淚或許是當年雨水多,濕氣大的原因,萬壽山鬧鬼誰也沒見過,但所謂的“鼓樓冒煙”,卻是實實在在有人看見的。每天傍晚,鼓樓西側的獸頭上,總是會冒出一股青煙,忽高忽低飄拂不定,會道門乘機散佈“鼓樓冒煙,要變天”的謠言。這事很快傳遍全城,成千上萬的市民聞風前往鼓樓,一時間人心惶惶,甚至連天津、河北的人都趕來圍觀。北京公安局的同志通過望遠鏡觀察,發現“煙霧”其實是許多飛舞的小蟲,雖經反復解釋,但群眾不願相信。9月15日,公安人員邀請中國科學院昆蟲所的研究人員,在樓上搭起腳手架公開“登樓擒妖”。研究人員登樓的時候,一位老太太還附耳勸告說:“孩子,可別去幹這傻事,那是神鬼顯靈,天地之意。”研究人員在樓下無數民眾的親眼目睹下,爬上鼓樓,用白布罩捕得大半網兜的“煙霧”,並將這些小蟲子裝瓶示眾,告訴大家這些都是產於什刹海及附近臭水中的一種“搖蚊”,不僅鼓樓有,其他地方也會有。至此,“鼓樓冒煙”的謠言才平息下來。^⑦接著,9月16日、17日、20日,《人民日報》、《光明日報》、《北京日報》等重要媒體,均以《鼓樓真的冒煙嗎?》、《傳說鼓樓冒煙原是搖蚊屬集》、《鼓樓“冒煙”真相大白》等為題進行了闢謠報導,而且將之佈陳於各個陳列館,以便群眾觀看。風行一時的謠言就此擊破,有力地擊退了會道門的輿論攻勢。

華北地區一貫道猖獗,因而闢謠工作也更加艱巨。在蘇魯豫邊區,“反革命特務分子曾對人民政府的公糧負擔和發展生產等政策進行破壞宣傳。但當該區各縣幹部公開在農民中以實事實例說明這些政策對獎勵生產的作用後,謠言就完全被戳穿了。許多農民表示:過去聽見那些傳言,本來就是半信半疑,這一下子可弄明白了。很多村莊的農民都逼著造謠者當眾承認錯誤”。^⑧

(三)“追”是為了順藤摸瓜、堵源截流。

政治謠言往往具有較強的時事性、針對性,流傳範圍較廣,各地此類謠言在內容和形式上頗有雷同之處,這就說明政治謠言的生產和傳播是有計劃、有組織的。正因如此,中央政府將之上升到了你死我活的政治高度來對待,認為“追謠主要是公安部門的責任”。^⑨每當遇到重要的反革命謠言事件,各級黨委宣傳部即與公安部門通力合作,順藤摸瓜、追本溯源,務使製造謠言的首惡分子受到嚴厲懲辦。“要使幹部與廣大群眾懂得,在人民民主的中國,決不許敵人亂說亂動,謠言是完全非法的,造謠惑眾的人便是人民的敵人。對造謠者一定要跟蹤追查,追出造謠的人來,把他送政府法辦,並使他向群眾坦白,使群眾瞭解事情的真相。”^⑩

一般來說,我們都認為謠言來無影,去無蹤,很難追溯其本源,那是因為我們個體沒有足夠的精力和能量來追蹤謠言的足跡。同樣的工作,一旦動用“公安”這一國家機器來追查,就不是什麼辦不到的難事。比如,北京海淀公安分局對一貫道道首姜毓德進行嚴密監視、偵察之後,即以查戶口為名進屋檢查,果然查獲國民黨旗和美國國旗、武器,以及“反動讖語(謠言)底稿”。^⑪1950年7月,瀋陽市公安局對部分特務及會道門首要分子進行搜捕,也當場搜出各種反革命證件、武器以及謠言底稿。^⑫搜出了“謠言底稿”,就能充分證明他們謠言製造者的首惡身份。公安部門通過縝密偵察,不僅能夠追溯反革命謠言的就近源頭,甚至還順帶查清了“流傳華北甚久的‘拍花’謠言,即為該道(一貫道)所捏造與散佈”。^⑬

新政府不僅要求公安人員闢謠追謠,而且向全體人民發出了號召:“我們必須從每個商店、工廠、企業單位、公共團體,動員從業人員,隨時監視被管制的分子,並隨時追謠與檢查可疑分子,使匪特奸諜無法在我們首都工商業界隱匿與活動。”^⑭“同志們人人要做公安員,宣傳員,警備員,止謠,闢謠,追謠。”^⑮

七、謠言治理：殺、關、管

所謂武治，也即從謠言製造者和散佈者一方入手，針對謠言家實施嚴厲的政治打擊，我們可以稱之為“鎮壓模式”。新華社 1950 年 10 月通稿《粉碎反革命謠言》，無疑代表了黨和政府對於政治謠言的認定原則和治理方向，文中說：“在中國大陸基本上解放以後，公開持槍的敵人雖被消滅，暗藏隱蔽的敵特在美蔣指使下仍在繼續其破壞活動。敵人進行破壞活動的方式是各種各樣的。而其中主要的方式之一，就是捏造和散放謠言，以擾亂人心，破壞國家的秩序。”^⑤明確地將政治謠言的製造者和散佈者放在“敵人”的位置上來認識。

針對建國初期“反革命活動猖獗”的情況，中共中央先後發過兩份《關於鎮壓反革命活動的指示》。1950 年 3 月 18 日的指示中強調說：“反革命分子的活動仍然是十分猖獗的，而我們工作中的缺點亦給了反革命分子以造謠和鼓動群眾的機會。對於這些反革命活動，各地必須給以嚴厲的及時鎮壓，決不能過分寬容，讓其猖獗。”但同時也強調說：“在我們工作有缺點的地方，必須迅速認真地糾正缺點，以便安定民心，孤立反革命分子……只有一方面認真地安撫人民，糾正自己在工作中及作風上的缺點，另一方面給反革命分子的暴動、搗亂、破壞行為以嚴厲的鎮壓，又對其脅從分子、罪惡不大的分子給以寬大的處理，令其改過自新，才能鞏固地建立人民的革命秩序。”^⑥不過，朝鮮戰爭爆發之後的 1950 年 10 月 10 日，新發的“雙十指示”中，語氣明顯變得更加嚴厲，強調必須對於一切“繼續進行反革命活動”的分子“予以嚴厲制裁”，“必須堅決地肅清一切危害人民的土匪、特務、惡霸及其他反革命分子”。^⑦

公安部長羅瑞卿 10 月 26 日提交給中央的《關於全國公安會議的報告》中，將具體的鎮壓措施歸納為“殺一批、關一批、管一批”的原則，認為這是“對反革命實行專政的必要手段”。具體辦法是：一、“必須處決一批罪大惡極怙惡不悛的、在解放後甚至在經過寬大處理後仍然繼續為惡的反革命分子。只要掌握不冤枉好人，分別輕重兩個原則，我們即可少犯或不犯錯誤。”二、“對於可以不殺的特務分子，及反動黨團的中上層分子，要關一批，即判處徒刑，強迫勞動，加以改造。”三、“一般特務分子和反動黨團的下級黨務人員，雖不逮捕懲罰，但亦須剝奪他們的政治權利並進行一定時期的管制。”報告中還特別強調說：“會門——特別是一貫道——是目前和我們作鬥爭的最大的反革命組織。當然，在處置的政策上，應該謹慎，因為它與廣大群眾性的迷信行為糾纏在一起。”^⑧毛澤東對於“應殺”的標準也曾給過一個“請注意打得穩，打得準，打得狠，使社會各界沒有話說”的指導方針：“所謂打得穩，就是要注意策略。打得準，就是不要殺錯。打得狠，就是要堅決地殺掉一切應殺的反動分子（不應殺者，當然不殺）。”^⑨

那麼，哪些行為屬於“反革命謠言”呢？中央人民政府 1951 年 2 月 21 日頒佈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懲治反革命條例》第十條可以視作對於反革命謠言的界定：“一、煽動群眾抗拒、破壞人民政府徵糧、徵稅、公役、兵役或其他政令之實施者；二、挑撥離間各民族、各民主階級、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或人民與政府間的團結者；三、進行反革命宣傳鼓動、製造和散佈謠言者。”^⑩

殺、關、管的霹靂手段對於短時間內肅清各種破壞社會穩定的政治謠言，對於打擊異己、爭取民心、鞏固新政權無疑起到了重要作用。老百姓是很愛看“槍斃反革命”的，北京市於 1951 年 5 月 22 日對 221 名反革命分子執行槍決，每個刑場都聚焦了上萬人觀看，槍聲一響，群眾歡聲雷動，連聲高呼：“感謝政府為民除害！”^⑪

按毛澤東的說法，鎮反運動一共殺了 70 萬，關了 120 萬，管了 120 萬（該數字依據 1954 年 1 月

14日公安部副部長徐子榮《關於鎮反以來幾項主要數字的統計報告》)。^⑧70萬顯然不是個小數目，主要是運動後期有些失控，許多地區為了湊足鎮反指標，難免製造一些冤假錯案，但總體來說，鎮反運動得到了廣大民眾的普遍支持、熱烈回應。如果我們將前面據北京市案例統計出來的43.2%謠言家的比例來乘以71.2萬被鎮壓的反革命分子，可以大致估算出在鎮反運動中，全國被槍斃的謠言家大約在31萬左右。

鎮反運動之後，不僅整個社會的治安狀況明顯好轉，輿論空氣也清爽了許多，謠言滿天飛的現象得到了暫時遏制。這不僅是因為有30多萬謠言家被斃掉了，更因為殺一儆百的震懾作用。鎮反運動極大地樹立了毛主席和新政權在民眾觀念中的威權形象，在華東地區，許多翻身後的農民“紛紛撕毀菩薩像，換上毛主席像”。^⑨

鎮反運動效果非常明顯，甚至於成為中國政府社會治理的一種常態應急模式。每當敵對勢力猖獗、社會治安惡化、謠言瀰漫之際，從重從快的“嚴打”就會成為社會治理的救急良方。國家機器以秋風掃落葉的雷霆之勢，對造成社會不安的破壞勢力實施嚴厲打擊。“鎮反”“嚴打”作為非常時期的非常之策，無疑具有維護政權合法性的合理因素，但是在太平盛世的當代中國，尤其是網絡文化日益發達的自媒體時代，如何建立一個更常規、更完善、更切實可行的社會謠言管理體系，應該是擺在我們面前的一個嚴肅問題。正如習近平總書記說的：“六十多年過去了，我們取得了巨大進步，中國人民站起來了，富起來了，但我們面臨的挑戰和問題依然嚴峻複雜，應該說，黨面臨的‘趕考’遠未結束。”^⑩

①讓·諾埃爾·卡普費雷：《謠言——世界最古老的傳媒》，鄭若麟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39~243頁。

②沈遠新：《政治謠言：界定、生存機制及其控制》，重慶：《探索》，2000年第1期。

③王燕、劉瑩：《從新聞媒體看政治謠言的政治管理》，鄭州：《新聞愛好者》，2012年第22期。

④毛澤東：《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0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第194頁。

⑤羅瑞卿：《羅瑞卿局長在北京市第二屆第四次各界人民代表會議上關於一年來鎮壓反革命分子破壞活動的報告（1950年12月29日）》，北京市人民代表大會辦公廳，北京市檔案館編：《北京市人民代表大會文獻資料彙編（1949~1993）》，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年，第108頁。

⑥⑨佚名：《京市軍事管制委員會軍法處接受人民要求將五零五名反革命罪犯分別判刑》，北京：《光明日報》，1951年5月23日。

⑦王斐然：《中國人民解放軍北京市軍事管制委員會軍法處佈告》，北京：《光明日報》，1951年8月24日。

⑧⑤陸仲偉：《一貫道內幕》，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95、194頁。

⑨⑩邵雍、張姚俊：《一貫道在上海的流傳與衰亡》，上海市檔案館編：《上海檔案史料研究》第9輯，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10年，第109頁。

⑩永登縣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永登縣志》，蘭州：甘肅民族出版社，1997年，第528頁。全國有多個地區流行該口號。

⑪《蕩滌塵埃》課題組：《蕩滌塵埃：新中國反邪教鬥爭》，鄭州：鄭州大學出版社，2001年，第150頁。

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1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年，第386~387、387、120、364、442、386~387頁。

⑬中國青年社：《反對謠言》，北京：青年出版社，1950年，第1頁。

⑭佚名：《京軍管會接受廣大人民要求槍決反革命罪犯一九九名》，北京：《光明日報》，1951年3月26日。

⑮⑯⑰黎砂：《粉碎反革命謠言》，北京：《人民日報》，1950年10月17日。

⑱施愛東：《災難謠言的形態學分析——以5.12汶川

- 地震的災後謠言為例》，南寧：《民族藝術》，2008年第4期。
- ①⑦周而復：《上海的早晨》第1部，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79年，第94頁。
- ①⑧②③④⑥④④古肱：《重慶的“一貫道”》，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四川省重慶市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重慶文史資料》第23輯，重慶：內部資料，1984年，第217頁。
- ②⑩⑩范春三、袁東旭：《舊中國三教九流揭秘》上冊，北京：中國社會出版社，1997年，第127、132頁。
- ②①②④中共梓潼縣委黨史研究室編：《基本完成社會主義改造時期梓潼黨史資料彙編》，四川梓潼：內部資料，1991年，第51、52頁。
- ②②⑤③③綿陽市公安局編：《綿陽市公安局志》，成都：四川辭書出版社，1995年，第87、88、87頁。
- ②⑦炎陵縣檔案史志局：《中國共產黨炎陵縣歷史》第2卷，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10年，第31頁。
- ②③③③榮惠：《中國的旁門左道》，北京：西苑出版社，2000年，第31、31~32頁。
- ②⑨朱明鏡：《接收“總統府”紀事》，南京市政協文史和學習委員會編：《紅日照鐘山——南京解放初期史料專輯》，南京：南京出版社，1999年，第49頁。
- ③⑩當代北京編輯部編：《當代北京什刹海史話》，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2014年，第64頁。
- ③①徐貴：《一貫道在西山區的罪惡活動》，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昆明市西山區委員會文史資料委員會編《西山區文史資料》第7輯，雲南昆明：內部資料，1997年，第38頁。
- ③③⑤⑩楊生國：《遵義縣剿匪鬥爭》，中共遵義縣委組織部、中共遵義縣委黨史研究室編印，貴州遵義：內部資料，2010年，第94、94頁。
- ③④紅安縣誌編纂委員會：《紅安縣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174頁。
- ③⑤張國連、李學芳：《建國初期槐店鎮取締反動會道門的鬥爭》，沈丘縣政協文史委員會編：《沈丘縱橫》第6輯，河南沈丘：內部資料，2012年，第98頁。
- ③⑥邵雍：《近代江南秘密社會》，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365頁。
- ③⑦江蘇省地方誌編纂委員會編：《江蘇省志 公安志》，北京：群眾出版社，2000年，第117頁。
- ③⑨④③孔祥濤、劉平：《我看中國秘密社會》，南寧：廣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54、254頁。
- ④①炎陵縣檔案史志局：《中國共產黨炎陵縣歷史》第2卷，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10年，第30頁。
- ④②袁立新：《反動封建會道門在湯原的覆滅》，載政協佳木斯市委員會《佳木斯文史資料》第16輯，黑龍江佳木斯：內部資料，1993年，第19頁。
- ④⑤周而復：《上海的早晨》第2部，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79年，第386頁。
- ④⑥侯松濤：《抗美援朝運動中的社會動員》，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博士學位論文，2006年，第37~38頁。
- ④⑦一粟：《一場潛伏與反潛伏的鬥爭》，豐城市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豐城市政協政宣文史科編：《豐城文史資料》第5輯，江西豐城：內部資料，1993年，第33頁。
- ④⑧佚名：《防止獸疫傳染，調查家禽家畜》，北京：《光明日報》1949年12月7日。
- ④⑨中共永登縣委黨史辦公室編：《中國共產黨永登歷史》，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23-24頁。
- ⑤①貴州省綏陽縣軍事志編：《綏陽縣軍事志 1597~2006》，貴州綏陽：內部資料，2009年，第274頁。
- ⑤②何煒明：《油城軼事》，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39頁。
- ⑤③馮振權、吳建中：《建國初期安寧的革命鬥爭形勢》，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雲南省安寧市委員會文史資料委員會編：《安寧市文史資料選輯》第8輯，雲南安寧：內部資料，1997年，第36頁。
- ⑤④楊日泉：《“割蛋”是怎麼一回事》，載政協應縣文史資料委員會編《應縣文史資料》第8輯，山西應縣：內部資料，1995年，第90~91頁。
- ⑤⑤中共山西省委黨史辦公室編：《陶魯箴文集》上冊，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13年，第85頁。
- ⑤⑦李若建：《虛實之間：20世紀50年代中國大陸謠言研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1年，第78頁。
- ⑤⑧中共山西省委黨史辦公室編：《賴若愚紀念文集》上冊，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12年，第303頁。
- ⑥⑩中央檔案館、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中共中央檔選集 1949年10月~1966年5月》第5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2頁。
- ⑥①佚名：《黨的宣傳網一年來發展的情況和今後進一步鞏固和發展的目標》，北京：《人民日報》，1952年1

月1日。

②⑥⑦⑧⑨新華社：《華北各地組織宣傳力量展開反謠言鬥爭》，北京：《光明日報》，1950年10月21日。

⑩顧明遠主編：《中國教育大系 20世紀中國教育》第3卷，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2508頁。

⑪陳明光：《深入發動群眾，開展清匪反霸鬥爭》，中共人民政治協商會議貴州省興義市委員會文史資料委員會編《興義文史資料》第7輯，貴州興義：內部資料，1997年，第97頁。

⑫劉憲：《繁峙縣取締一貫道鬥爭記略》，載山西省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編：《陽光下的山西：取締反動會道門鬥爭紀實》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99年，第125頁。

⑬佚名：《京市教工學生聯合代表大會勝利結束通過全市師生員工愛國公約》，北京：《光明日報》，1951年4月26日。

⑭李世明：《抗美援朝運動中的徐州小學生》，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江蘇省徐州市委員會文史委員會編：《徐州文史資料》第27輯，江蘇徐州：內部資料，2007年，第52頁。

⑮⑯穆玉敏：《建國十年要案揭秘》北京：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2005年，第237、237頁。

⑰春陽：《一貫道是什麼東西》，北京：工人出版社，1951年，第20頁。

⑱顯華：《京市公安局舉辦一貫道罪證展覽》，北京：《光明日報》，1951年1月18日。

⑲楊正鳴：《民國時期的恐怖活動與反恐》，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79頁。

⑳王林瑤、張立峰編著：《有趣的昆蟲世界》，北京：金盾出版社，1994年，第130~133頁。

㉑遼寧省地方誌辦公室編：《1949.10-1961遼寧省志·大事記》（初稿），1992年，第21頁。

㉒佚名：《反動迷信組織必須嚴予取締》，北京：《光明日報》，1950年12月20日。

㉓新華社：《首都工商業者動員起來！積極協助政府肅清反革命分子》，北京：《光明日報》，1951年3月11日。

㉔本報南京通訊：《廣泛展開時事學習撰文揭露美帝面目》，北京：《光明日報》，1950年11月27日。

㉕公安部政策法律研究室編：《公安法規彙編 1950~1979》，北京：群眾出版社，1980年，第98頁。

㉖楊奎松：《新中國“鎮壓反革命”運動研究》，河南開封：《史學月刊》，2006年第1期。

㉗新華社：《蘇、浙、皖等地翻身農民歡慶土地還家積極準備大生產》，北京：《人民日報》，1951年1月25日。

㉘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習近平關於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論述摘編》，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第85頁。

作者簡介：施愛東，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研究員、博士生導師，中國民俗學會副會長。北京 100732

[責任編輯 桑海]